

下山进城的野猪，雄性比例显著高于雌性。

南京红山野生动物园兽医院院长邓长林，今年一共救了23头野猪。去年更多一点，是31头。尽管新闻中野猪似乎更多出现在秋冬，但邓长林回忆，现实中一年四季差不多。过去十几年，除了在红山动物园保障动物健康，他也要参与到野猪的救助。

通常情况下，南京市民遇到野猪，打电话报警，警方再把情况分享给邓长林和同事，请求协助。并非每一个警情都需要邓长林赶到现场。他接到电话后，会进一步问清楚，野猪所处的位置，以及健康状态。

在空旷地带，或是野猪正常生活的栖息地，邓长林建议人们不要管，也不建议干预或救助。若野猪进入了人员密集场所，比如学校或工厂，可能会和人类产生冲突，他们会携带麻醉针，现场将野猪麻醉，然后带回红山。待野猪醒来，完成健康评估，再放归野外。这一套救助和放归的流程，如今最快可以在一天内完成。

“效率低，但野猪还是得抓”

如陈月龙所说，当下探讨人类与野猪的冲突时，理应对冲突的类型和原因进行细分。除了区分野猪本身习性是否改变，野猪出现的场景是农田或城市，也在影响人们的态度。

“在南京，尤其是那些经常去紫金山爬山的市民，他们在路上见到一头野猪，不至于大惊小怪，围观或投喂。他们见得多了，野猪也

逐渐对人类脱敏，彼此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。”陈月龙说道。

但是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，农民们面对野猪，很难如此平静，尤其是见到自己的作物被野猪吃掉之后。今年43岁的湖南岳阳人杨志军，对此深以为然。杨志军在今年9月组建了一支小队，到南方各地参与野猪捕猎。在安徽马鞍山，他亲眼见到有农民数十亩农田的稻谷被野猪拱过，“农民直接放弃了。他如果请人收稻谷，能收的很少，算上人工成本，可能入不敷出。所以他们对捕猎野猪非常迫切，非常欢迎我们，甚至说可以自费，请我们上山抓猪”。

杨志军曾是一名荣立三等功的老兵，退伍后在岳阳自主创业，开了一家红外设备公司。工作之余，热爱户外运动的他也加入了当地的护农队和狩猎协会，对捕猎野猪这件事不陌生。

今年9月23日，宁夏西吉县林草局公开“悬赏”捕猎队伍，每捕猎一头成年（40公斤以上）野猪奖励2400元。这件事激起了杨志军的好奇心，经营公司的收入又足以支撑这方面的支出，自己也认识全国各地的护农队，他决定加入到捕猎野猪的行动中。

他组建了一支3人团队，包括自己和“射手”、摄影师。由于自己原本经营红外设备，设备不是难事。杨志军还开通了自己的抖音号——“老杨是个人物”，拍摄和记录自己的抓猪经历。

由于岳阳距离西吉路途遥远，老杨的第一站并没有前往西吉。他今年第一次捕猎野猪，在江西抚州，忙活到半夜，一头猪都没抓到。

2020年以前，一些护农队和狩猎协会，可以合法装备猎枪，但2020年之后，猎枪都被收了回去。在老杨看来，如今的抓猪方式回归了传统，只能靠人和狗。他觉得这种方式“效率太低了”。

过去两个月，老杨根据护农队提供的信息，先后到过江西、河南、安徽和江苏等地抓猪。通常他们会和当地的护农队合作。团队只有3人，而抓猪除了用猎犬围捕，还要在野猪逃跑线路上布网，需要更多人手。

“我们会先带着红外成像无人机，到老乡说有野猪出现的地方进行搜索，大致确定野猪的位置。位置确定后，再带着狗队以及护农队队员到达现场，通过地图分析野猪所在区域的情况。”老杨介绍说，“比如一块方圆一公里的地方，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，分析在进行猎捕追赶的时候，野猪会朝哪个方向跑，然后在它可能会路过的地方去铺网。把网铺好后，领狗的人进行追赶，网的周边，每隔三五十米就站一个人。狗把野猪追到网里面后，网就能把它困住。”

在各地抓过猪后，老杨对野猪有了新认识。江西南部，盛产脐橙和柑橘。赣南野猪不仅吃橘子，还会给橘子剥皮。安徽和江苏，靠近南京的地带，野猪不太怕人。距离最近时，老杨和野猪只有两三米，野猪也不会跑。

在安徽马鞍山，野猪的数量令老杨惊叹。用无人机查看，一晚上能见到两三百头野猪。面对如此多的野猪，老杨忙活了5个通宵。尽管效率不高，他还是想为那些农民做点事情。“我成长在农民家庭，

捕猎野猪，在2024年秋天成为一条流量赛道。